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

○刘娟

摘要: 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文化之间文化精神传承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们开始以更加客观而且全新的角度去解读莎剧,尤其是开始关注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介绍了莎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现状、在国内取得的成果、仍然存在的不足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本文在展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原型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的同时,也为人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 圣经原型 莎剧 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文化之间文化精神传承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研究者们开始以更加客观而且全新的角度去解读莎剧,尤其是开始关注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目前,莎学批评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戏剧作品与《圣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圣经文学原型在莎剧中的广泛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莎剧中圣经原型研究的理论依据

20世纪初期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这样认为,原型或称原型意象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它们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1]。弗莱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原型”即是文学作品中“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即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神话象征。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模式之一。

在弗莱的批评体系中,各种文学类型被看作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而在各种神话中,弗莱特别推崇宗教圣典,尤其是基督教《圣经》,认为它是“一种特定的神话,一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独一无二的原型结构”^[2]。在弗莱看来,《圣经》是“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并“对文学中的象征体系起着主要的影响”^[3]。莱肯也曾指出:“《圣经》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4],因此,弗莱以及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西方文学,其必要前提就是熟读基督教《圣经》。《圣经》对后世作家作品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出生在16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自然也不能例外。

16世纪的英国正是基督教十分兴旺活跃的时期,英译《圣经》的高潮也正是发生在这一世纪。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莎士比亚必然也会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更何况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对《圣经》十分熟悉的基督徒,因此

基督教文化必定会在他内心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影响他的创作。我们在阅读莎翁的作品时总能深深感受到其字里行间所渗透的仁慈、博爱、宽容等基督教精神,这正是莎翁受到《圣经》影响的一个主要表现。不过除此之外,莎剧中大量《圣经》原型的运用也是二者之间存在影响的一个有力证明,它是莎翁受到《圣经》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现在已有研究者开始着重从原型的角度来考察莎剧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莎剧原型研究主要以原型批评为方法,将《圣经》原型与莎剧中相应内容进行比较来寻找二者之间的类似性,从而证明基督教《圣经》对莎翁影响的存在。此类研究能够促使读者在解读莎剧时自觉地将其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以相应的圣经原型为参照,使得他们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莎剧,并由此对其获得一种更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故而,莎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不仅以具体详实的例证直观地展示了莎翁创作深受《圣经》影响的事实,令人信服,而且还为解读莎剧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使人们对莎剧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

二、国内研究的现状

目前,尽管国内此类研究相关论文也不时见诸于各类期刊,但相对来讲,整体数量并不多,而国内核心刊物上收录的则更少,从总体上看,此类研究在国内仍处在一个初始阶段。为了具体地展现中国学者对莎剧中圣经原型研究的现状,本文试根据在论文统计方面比较权威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中国学者在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的数据,分析一下关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原型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笔者共检索到18篇涉及到莎剧中圣经原型研究方面的论文,其公开发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0—2006年间。这些论文讨论角度的侧重点依次为莎剧中的圣经人物、母题、结构模式、情节、意象原型五个方面,而就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和观点而言,则又主要具有如

下特征。

莎剧中的圣经人物原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莎剧中的耶稣基督原型和大卫、摩西原型的研究上。耶稣基督原型人物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常出现的人物类型之一。其中,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有哈姆莱特、罗密欧和朱丽叶等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则都是以《圣经》中的摩西、大卫为原型来塑造的。

在圣母原型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恨、崇拜、忏悔、上帝、罪等圣经母题在莎剧中的显现。研究者们在对恨、崇拜、忏悔、上帝母题进行研究时又往往将其分解成不同的侧面,通过考察各个侧面在莎剧中的呈现来论证莎剧对某一原型母题的借用。在考察“罪”这一母题时,研究者则主要分析了“罪”在莎士比亚喜剧、悲剧以及历史剧中所呈现的不同的特征,由此展现莎士比亚对“罪”认识的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以及他对待基督教态度的不断变化和一生思想探求的轨迹。

在圣经结构模式原型研究方面,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圣经中的U形叙事结构模式,即《圣经》叙事所遵循的“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模式。反观莎士比亚,无论是其戏剧作品,还是他的整个创作过程都呈现出了《圣经》这种U形的叙述结构模式。此外,有研究者还指出,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模式也是莎剧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型结构。

在圣经情节原型方面,“善恶冲突情节模式”是研究者们讨论的较多的,另外还有“性格弱点导致悲剧”情节模式。此外,有学者还指出《暴风雨》的情节暗含了《创世记》中神话和族长的传说。

在圣经意象原型方面,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蛇(或魔鬼)这一原型意象上。蛇的意象旨意主要是恶,不过同时它也创造了善,它使人类从懵懂走向了智慧。在莎翁的笔下,尽管蛇的原型被置换成了人,但他们一样具有欺骗、诱惑、背叛等邪恶的性质,如《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奥塞罗》中的伊阿古、《李尔王》中的里根等人。不过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邪恶才更加凸显了英雄们的崇高,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正如《圣经》中的蛇一样在破坏的同时也创造了善。

三、对国内研究现状的认识

可见,目前国内研究者在莎剧中的圣经原型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各类圣经原型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巨大影响,而且进一步论证了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文化之间这种犹如“水中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的同时,也应冷静地看到此类研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往往主要关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母题、人物、结构、故事情节以及意象等与《圣经》相应内容之间的平行比较,即一种外在的对应的比较。它虽然清晰地展现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运用的圣经原型,并使读者感受到了莎剧中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其在研究《圣经》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过程中,却忽略了作家的能动性,使莎士比亚似乎成了一个《圣

经》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从而造成了研究的不充分。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作品中借用了大量的圣经原型,这固然是因为受到了基督教《圣经》的影响,但是莎士比亚在运用这些圣经原型时也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并不只是对圣经原型的被动接受。可以说,在多数情况下,莎剧中这些圣经原型的运用都是为特定的创作目的服务的,是莎士比亚精挑细选的结果,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作家在此借用圣经U形叙事结构主要是为了将罗密欧、朱丽叶与耶稣基督进行对比,从而显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牺牲的崇高之美。

此外,作家的能动性还体现在他借用圣经原型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适当的置换、变形或者溶入新的内容。如耶稣的牺牲使人敬畏上帝,而莎翁悲剧中很多耶稣式人物的牺牲更多地使人感到恐惧和警醒。莎士比亚在此并不是为了要宣扬上帝的威力,而是在借用耶稣原型的同时又融入了时代的内容,抨击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各种弊病,反映出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由于作家在运用圣经原型时具有能动性,因此我们在对莎剧中的圣经原型进行研究时,除了以详实可靠的论据证明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借用了某圣经原型之外,还应适当地在此基础上考察此圣经原型在莎剧中的意义或演变。这样,我们在了解到某一圣经原型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的同时,更能反观莎士比亚对这一圣经原型应用的能动性,从而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获得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

现在也有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莎士比亚在《圣经》影响下的能动性给予了关注。不过,正所谓独木难成林,从整体上来看,作家在《圣经》影响下的能动性仍然是目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还需要后来研究者的进一步补充和提高。不过,任何一种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正是对前人研究成果不断吸收,并对前人研究的误区和盲点不断纠正和补充的过程。这一过程则需要许许多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关于圣经原型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仍不成熟,但后来的研究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与发掘,必将促进莎剧圣经原型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本文为安徽省级课题项目部分研究内容。项目名称:中国莎学研究新视野——莎士比亚圣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07sk023)

注释:

- [1]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 [2] [3] [加]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第417页。
- [4] [美]勒兰德·莱肯:《圣经与文学》,徐钟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刘娟 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外语系 232001)